

◀ (上接 4 版)

内,到时请他到复旦大学作个报告,他欣然同意,并说:“我还一直没有见过你老师。”我又提出想翻译他的书,在国内出版。他说:“我的书可不好翻,你先试试吧。”我问费正清的序是否照译,还提到春节时在孔飞力家见过费先生。何先生说:“他可是一直对我求全责备的。”“不过他也不得不肯定我的成果,只是在序中写得有点勉强。”他同意我保留这篇序言。我向何先生保证,译稿一定会送他审阅,联系好出版社后一定会征得他同意。何先生从书架上取出他的《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》和《中国会馆史论》送给我,他说:“你可以看看我对张光直的批评。外界对张的评价很高,可能只是对他的考古学。涉及到环境变迁,他的结论是错的,他其他方面的知识有限。而我的论文曾征求过国际顶级生物学家、地学家的意见,他们都给我很高评价。你比较一下,高下立见。”

告辞时何先生坚持要送我回去,说那一带晚上不安全。我下车后,何先生还停着车,说要看我进门后才放心离开。前几年与艾恺教授在在微博上聊天,他提及往事,戏称“何先生从未光临过寒舍,葛教授好大的面子”。

我 预计 6 月回国,在最后几个月中抓紧时间,翻译了前面两章,抄在国内带来的 500 格大稿纸上,寄给何先生请他审阅。他回信说近来很忙,留着慢

慢看。

当年 8 月,我随季龙先师去北京参加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工作会议,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。那天下午散会早,我们回房间早,忽然何先生出现在门前。原来他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访,正在北京,我们这次会议是由社科院召集的,他得知谭先生在就找来了。他们一见如故,谈得很投缘。得知他这次来访时间较长,社科院还安排他去昆明和上海,先师再次邀请他访问复旦大学。或许因为是初次见面,或许因为他对先师特别尊重,这次何先生没有月旦人物,也没有骂人。何先生走后,先师说他是南人北相,不仅相貌,各方面都像北方人。

回校后,我们以研究所的名义向学校打了报告,报了接待何先生来访的计划。那时外国学者来访不多,一方面外事纪律严,涉及校外的活动都要预告报市外办批准,如去外地活动还得由市外办通报对方外办;另一方面接待隆重,一般都得由校领导出面宴请,招待参观游览。好在何先生名气大,一向被当作“爱国美籍华人”,所以我们报了请他作学术报告,连具体题目都没有,外办并未像通常要求那样报学术报告的内容。

10 月间,何先生与师母由昆明到上海。次日我陪她们去无锡游览,因持市外办介绍信预购了软席火车票,由无锡市外办派车接待,午间去外办定点的太湖宾馆用餐,全天活动都很顺利。没有想到在无锡火车站虽

持市外办介绍信,却没有买到原定车次的软座票,只能推迟一班。在候车室等待时,何先生很不耐烦,我十分惶恐,师母却说:“不要睬他,他就是这种脾气。”

那时复旦还没有专门的学术报告厅,一般就安排在几个大一点的教室。考虑到何先生的地位和影响,我们借了一个可容纳二百来人的大教室。知道后何先生很不高兴,说:“云南大学是请我在大礼堂作报告的。”我陪何先生进教室时,已经座无虚席,过道与窗边都站着人,历史系、经济系、相关研究所一些知名教授都坐在下面,气氛相当热烈。何先生报告后,多位师生提问,不仅对他的论著熟悉,而且都提出希望他再作阐发的要求。会议结束时,何先生兴致不减,说:“毕竟是复旦大学!”

何先生告诉我他不久将从芝加哥大学退休,准备来中国发展。希望我回天津,但我不喜欢在天津和北京。当时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所开放程度有限,我并不理解何先生的“发展”是什么意思,以为只是来访问交流,作个学术报告。事后想来,何先生大概是按港台地区的模式,希望在他退休后大陆的高校或研究所能聘他任职,以便利他的研究。或许他此前已经在北京试探过,不得要领后才在上海这样说,以他的身份和脾气自然不会直接提出。但即使他正式提出,当时的中国大陆也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,无论北方南方都不会给他满意的答复。他还提到退休后准备迁居加州,芝加哥气候不好,冬天太冷,夏天又热。我知道美国不少华人教授都喜欢在退休后住在加州,一般会拿退休金在那里买一所房子养老。

回美国后何先生来信告诉我,他已退休并迁居加州,信上有他新的地址和电话。但不久他来信说已应加州大学鄂宛(Irvine,即尔湾)分校之聘,地址和电话也变了,他说新居宽敞漂亮,花园很大。事后得知此事是李中清促成,正好鄂宛需要中国史教授。而他的儿子们嫌他自己买的房子不理想,共同为他买了新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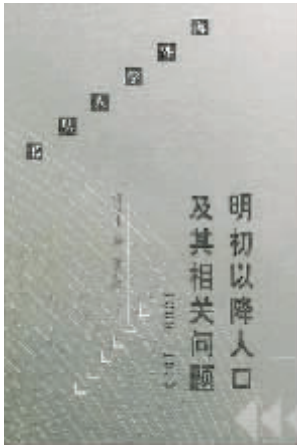
在 上海期间,我将新译好的几章交给何先生,何先生将原来留在他那里的译稿还给我,没有提出什么问题。我又请教几个翻

译中的问题,何先生一一作答。当时遇到最大的麻烦,是如何将书中引用的史料译回中文,何先生要求都要按原文,但那时国内的图书馆开放程度很低,特别是一些善本,往往只能通过熟人才能查到。个别材料由于原书所注卷数或出处有误,或者依据了稀见版本,一直无法查到原文。有些当代著作是在海外出版的,国内未有收藏。对何先生依据的稿本,更只能望洋兴叹。何先生让我将查不到出处的条目寄给他,由他找马泰来帮着查找核对。他还同意对实在找不到原版的,可以用其他相近版本代替。以后他寄回了几条在芝大图书馆核对过的材料,但胡适之父胡传《台湾纪录两种》(台北 1950 年版)直到书将出版还未找到,何先生只能自己据英文回译,并加了一条注:“作者声明,因迁居,此条原文一时不能查到,只好意译。”到 2000 年此书再版时,何先生还是找到了原文,将自己的译文替换下来。这时我发现,何先生的译文不仅贴近原意,连有些字句都一致,不能不钦佩他的记忆和理解。

胡传原文:
(余)生长草野,身经大难,复睹平世,亲见同治五六年间,自徽州以达宁(国)太(平)数百里之内,予遗之家,仓有粟,厨有肉,瓮有酒,各醉饱以乐升平,几乎道不拾遗,户不夜闭。

何先生据英译回译:
余于同治五六年间,目睹徽州、宁国、太平数百里间,居民家有余谷,厨有肉,瓮有酒,餐饌丰盛,时或畅饮至醉,无不尽情重享升平之乐。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。

到 1987 年,书稿已译全,引文原文也已核对完毕,大多已由何先生看过。不过他事先曾告诉我,由于不习惯看用横式稿纸写的简体字,所以不可能看得仔细。当时国内出版此类学术书相当困难,而我还是希望找一家信誉高、质量好的出版社。上海古籍出版社正编辑出版《海外汉学丛书》,魏同贤社长闻讯,力邀此书加入,但表示无法给海外的作者付稿费。我写信征求何先生意见,他回复表示信任这家出版社,不需要给他付稿费。即使有,他也建议都给译者。同时他要我将不久前在国内重新发表的《宋金时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》(原载《白乐天教授纪念宋史研究丛书》,1970 年巴黎出版)一文



作为附录收入。此书于 1989 年问世,书名按英文版直译为《1368—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》。

此书只印了 1000 册,对于这样一本经典著作,如此少的数量自然远远满足不了学术界的需求。书店里很快售完,出版社的少量存书也已告罄,只能将读者求书的来信转到我这里来。这本书成了我最珍贵的赠书,连我的博士研究生也未必能得到。海外曾有出版社表示过出版意向,但为便于国内读者,何先生和我都希望能在国内再版。到 2000 年,三联书店与我接洽,希望出版此书,我自然求之不得,何先生也表示同意。

我请何先生趁再版之机审定译文,他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,并要求将书名改为《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,1368—1953》,他说:“我这本书哪里是只讲人口?涉及面很广,实际上是一部经济史、社会史。”此书的英语原版出版于 1959 年,半个世纪来,何先生对中国人口史与相关问题的探索孜孜不倦,陆续发表了新的成果,如对宋金时期人口的估计,对南宋以来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等。前者已作为附录收入本书,后者已另出专著。何先生治学精益求精,自然希望用最新的成果中的观点或数据取代旧说。但就如何处理译文,我与何先生产生了分歧。何先生希望我直接更改原文而不加注释,我认为译者只能忠于原文,除非作者自己修改并作说明。对此何先生颇不以为然,并向吴承明先生等表达对我的译文的不满。

例如,对第六章第三节中卜凯对浙江省土地数字的估计,何先生曾要我改写,我坚持在三联版中保留原文,另加译注:作者在本书撰写时曾持卜凯对浙江省总数的

(下转 6 版) ➡



何炳棣与胡适